

民国文言小说史

张振国 著

凤凰出版社

民国文言小说史

张振国
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民国文言小说史 / 张振国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506-2631-7

I. ①民… II. ①张… III. ①文言小说—小说史—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7284号

书 名	民国文言小说史
著 者	张振国
责 任 编 辑	林日波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bbs.com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经济开发区朝霞路180号,邮编:226300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96千字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2631-7
定 价	55.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3-80237871)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民国旧体小说研究现状	4
第二节 民国文言小说的存在和发展概况	8
第一编 伤世昙花:民初文言小说的繁荣(1912—1919)	15
第一章 林纾与苏曼殊:过渡期的挣扎和孕育	24
第一节 林纾的文言长篇章回体小说	25
第二节 林纾及其文言短篇小说	33
第三节 情僧苏曼殊及其文言小说创作	41
第二章 民初文言长篇小说的异军突起	48
第一节 鸳鸯蝴蝶派与民初文言长篇小说	49
第二节 民初文言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品	55
第三节 民初文言长篇小说的成就与影响	63
第三章 民初的文言短篇小说集	73
第一节 李涵秋与《涵秋笔记》	73
第二节 吴绮缘与《反聊斋》	81
第三节 刘铁冷与《铁冷丛谈》《铁冷碎墨》	84
第四节 许指严与《十叶野闻》	87
第五节 胡寄尘与《黛痕剑影录》	89
第六节 徐枕亚与《枕亚浪墨》	91
第七节 杨凤徽与《南皋笔记》	93

第八节	陈其蕃与《蚊睫巢笔记》	98
第九节	梁纪佩与《粤东新聊斋》	100
第十节	其他作家的文言小说集	103
第十一节	民初纂辑体文言小说集	111
第四章	民初报刊文言短篇小说的繁荣与新变	141
第一节	清末报刊文言小说发展概况	144
第二节	民初报刊文言小说的感伤基调和时代精神	151
第三节	民初报刊文言小说的手法创新	167
第四节	民初报刊的旧体传奇小说	178
第五节	民初报刊的旧体笔记小说	186
第六节	民初的“别体”文言小说	196
第七节	“新”作家笔下的“旧”小说	207
第二编	桑榆晚景：民国中前期的文言小说（1920—1929）	217
第五章	二十年代的文言小说集	221
第一节	左全志《鹄突话》与程善之《骈枝余话》	221
第二节	汤冷秋《风尘琐记》《茶余随笔》与胡渔山《味痴剩墨》	226
第三节	潘衍《天涯闻见录》与饮香室主人《新新聊斋》 ...	230
第四节	朱鹤影《鹤影集》与郑逸梅《梅瓣集》	232
第五节	以“笔记”命名的小说集	234
第六节	傅向荣《儵游浪语》与项乃登《鰕觥纪闻》	240
第七节	搜奇记异的其他文言小说集	243
第八节	二十年代的纂辑体文言小说集	245
第六章	二十年代的报刊文言小说	254
第一节	二十年代的报刊文言短篇小说	257
第二节	报刊笔记体文言小说	264

第三编	余晖渐冷:民国中后期的文言小说(1930—1949)	275
第七章	三十年代文言小说的渐趋没落	277
第一节	民国“阅微体”小说的殿军:郭则沅《洞灵》“三志”	283
第二节	民国中后期的“聊斋体”:李逊梅《澹盦志异》	289
第三节	三十年代的其他文言小说集	301
第四节	三十年代的报刊文言小说	313
第八章	民国最后十年文言小说的消亡	321
第一节	四十年代的文言小说集	321
第二节	报刊文言小说的寥落	326
结 语		333
参考文献		337
后 记		345

绪 论

公元 1911 年,岁在辛亥,历史在看似偶然与必然的交错中,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宣布成立,从这年开始,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为止,史称中华民国时期。民国的建立让饱受屈辱的国人在意外之余又满怀期待,正如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中所说:“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①但辛亥革命的偶然性导致政局的纷纭复杂,新政权很快被袁世凯窃取,接下来的政局如戏台般充满变数,生旦净末丑各色人物粉墨登场。随着孙中山解职和袁世凯上台,再从袁世凯称帝到张勋复辟,从内阁风波到军阀混战,民国初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乱世。李泽厚先生说:“辛亥革命使政权实质并无改变,却由于甩掉一个作为政权中心象征的清朝皇帝,反而造成了公开的军阀割据,内战不已,人民的生命和权利连起码的保障也没有,现实走到原来理想的反面。”^②民国的建立并未改变当时中国的疲弱局面,“强邻侵侮,无力抵抗;国库空虚,专恃外债;军饷无着,乱兵肆劫”^③。但这种无序的局面也同时导致思想上

①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中国国民党周刊》,1927 年“中华民国开创纪念特刊”,第 2—3 页。

②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年,第 282 页。

③ 《忧时涕泪》,《申报》1913 年 1 月 3 日。

的混乱与多元,由于古今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当时的状况是“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自命‘胜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拿钱;既说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①这种新旧杂糅的状态使得民初的思想和文化发展呈现出多元化并存的局面。“有人曾把这一时期的前半比作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无道理。这的确是中华民族文化从衰败走向振兴的重要阶段。”^②也有人把民国时期比作中国古代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认为“此一时期学术思想之多元,学派之纷繁,只有春秋战国时期差可比并”^③。袁进先生说:“中国文学发展到近代,好比到了十字路口,具有多种选择的可能,因此这也像先秦时期一样,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最活跃的时期。”^④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民国,注定是个不平常的文学时代,传统的思潮尚未退去,革命的暗流悄然涌动,在这历史交替的特殊时刻,新旧体文学的碰撞带来了一份别样的精彩,最终以新文学的胜利和旧文学的消亡为结局。但旧体文学特别是文言小说的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甚至在民国初期掀起了一个虽短暂却又影响深远的高潮,因此这些作家和作品不应一直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去缅怀那段逝去的岁月,去观照那些虽旧犹新的作品,让我们去认识一个全新的文学史。

近年来,“民国文学”的概念逐渐被一些学者倡导,主张以“民国文学”指称 1912—1949 年间文学发展全貌的声音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民国文学”概念提出以后,人们开始尝试对一直受到忽视的民国

① 鲁迅《热风·五十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第 58 页。

② 黄兴涛主编《中华文化通史·民国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4 页。

③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华读书报》1996 年 12 月 25 日。

④ 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 页。

旧体文学进行研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葛留青、张占国先生所著《中国民国文学史》已经提出了“民国文学史”的概念。《中国民国文学史》给这一时期文学定的基调是:“民国时期文学是中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急剧的社会变革在文学上的反映。它所包含的内容是复杂的。民国时期文学的发展过程是民主主义的、积极进步的、革命的和无产阶级的文学同消极落后的、封建的甚至反动腐朽的文学相斗争的过程,其中居于主导地位并获得巨大成就的是前者。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亦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它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崭新的文学。这是民国时期文学的基本特征。”^①这一基调也就决定了作者关注的重点肯定是新文学。2003年,张富贵先生在《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现代文学”的称谓必然被取消而最终定名为“民国文学”。“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不但保证了古代文学的延续性,而且增加了“现代文学”的涵盖性,是一个“两全其美的称呼”^②。2009年,陈学祖先生在《重建文学史的概念谱系——以“民国文学史”概念为例》一文中指出:如以“民国文学史”作为指称1912—1949年文学史的概念,是值得肯定的,但应该将此期所有的文学现象纳入到其文学史叙述中,以使其历史叙述更符合此期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③。2010年,汤溢泽先生针对“民国文学史”概念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以“民国文学史”替代“新文学”史考》一文也提出了以“民国文学史”替代“新文学”、“现代文学”、“百年中国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等概念的构想^④。《论开展“民国文学史”研究的迫切性》一

① 葛留青、张占国《中国民国文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页。

② 张富贵《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问题》,《文学世纪》2003年第4期。

③ 陈学祖《重建文学史的概念谱系——以“民国文学史”概念为例》,《学术界》2009年第2期。

④ 汤溢泽《以“民国文学史”替代“新文学”史考》,《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文中指出中华民国史不可空缺“民国文学史”席位。“从形式、内容上看‘五四’新文学革了古文学的命,但‘民国文学史’也给一些被革命的优秀文言文作品以席位,也就是说白话文和文言文优秀作品、作家、流派不管南北东西在‘民国文学史’可安家落户。”^①2011年,丁帆先生也专门就“民国文学”谈到自己的看法,在其《给新文学史重新断代的理由——关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他的几点补充意见》一文中也提出应将“晚清”归属清代文学,将“民国文学”与“清代文学”分开。他同时指出:“在学科分类与大文学史的切割上,不宜再分什么‘现代’和‘当代’,且这也抹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域性特征,也还是限于大陆语境下的文学史格局,绝无大中华文学史的眼光和世界性的文学史气度。”^②王学东先生也发表《“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③一文,对民国文学史编写问题进行了探讨。以上是近年来学界对民国文学史概念和编撰构想的探讨,无论是站在古代还是现代的视角,民国文学都是我国文学转型期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一环节既应该包含旧文学,也应该包含新文学,缺一不可。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我们需要对一直被忽视的民国旧体小说特别是文言小说的存在和研究现状进行梳理。

第一节 民国旧体小说研究现状

民国的文言小说到目前为止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民国初年

① 汤溢泽《论开展“民国文学史”研究的迫切性》,《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② 丁帆《给新文学史重新断代的理由——关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他的几点补充意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3期。

③ 王学东《“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

曾被文学史家认为无杰出作品,是“最黯淡无光”^①的“低潮时期”^②。赵孝萱先生在《“鸳鸯蝴蝶派”新论》中说:“民初小说(1911~1918)是近代文学研究中向来遭忽视的领域。若论‘近代文学’,多着重于晚清,民国成立初几年的文学状况,向来只是匆匆带过的讨论附题而已。晚清(1840~1911)文学之论述材料,已是汗牛充栋;而‘五四’(1919)之后的‘新文学’研究更是现代文学的重心。因此,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8年的文学面貌,就成为近代文学研究较受冷落的边陲。”^③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对民国旧体小说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概括。

最早对民国小说特别是旧体小说进行专门研究的是范烟桥先生。1927年,范烟桥先生曾撰有一部《中国小说史》,其中有一节“最近十五年”即列举评价了辛亥革命以后十五年中的小说作者及其作品,以旧派为主,略叙新派,力图保存这一时期小说的史料。1961年,作者将“最近之十五年”那一部分加以补充,而所述限于旧派,不涉及新文艺小说,时期则到解放以前,名为《民国旧派小说史略》,后收入魏绍昌先生所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1984年修订)。《民国旧派小说史略》对民国旧体小说作家和小说类型如言情小说、社会小说、历史传奇小说、武侠小说、翻译小说、侦探小说、短篇小说(附笔记小说)的存在和发展状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作者在《概说》中提到:“这里说的民国小说,是指的旧派小说,主要又是章回体的小说。”“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学为壮大自己的力量,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曾经对旧派小说施以猛烈的打击。可是,由于它的源远流长,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故一时不易衰败。”^④在《概说》中,作者也否认了“鸳鸯蝴

①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36页。

② 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年中国近代文学编写小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77—380页。

③ 赵孝萱《“鸳鸯蝴蝶派”新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4页。

④ 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269页。

蝶派”的称谓,坚持认为自己这一路文人属于“民国旧派”,其创作的小说叫做“民国旧派小说”。他在文中委婉地说道:“‘旧派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虽然是个不甚光采(彩)的名词,但究其实际,亦不可一概而论。以作者论,固有高下之分;以小说论,亦有质量高低,内容正邪之别。而尤可注意者,是这种小说在数十年间所出版的数量,是惊人的。”^①关于民初短篇小说的发展特点,范烟桥先生总结说:“短篇小说的写作,一方面继承传奇文及笔记小说的体例,有头有尾,仍以情节为重;一方面则接受翻译小说的影响,从西洋小说中吸收了细致的人物心理和环境描写的方法,内容也逐渐转到截取事件的精采(彩)片断,就社会的角落,写小人物,提出问题。辛亥革命后,有反映革命秩序紊乱的,有叙述革命所引起的社会改革的,有反映新旧思想冲突的,有描写革命不彻底所存在的封建残余的,有暴露新兴势力的缺陷的,有发抒现实生活中的苦闷的,有刻划男女情爱的新变化的,有注目于小市民及劳动者的生活苦痛的……从严肃的题材以至滑稽、侦探、幻想之类均有”,“有创作,又有翻译;有文言,也有白话”^②。应该说这种描述抓住了民初短篇小说的发展特点,也是最早对民初旧体小说进行宏观研究的奠基性成果。

范烟桥先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民国旧体小说的研究都毫无起色,甚至让人谈虎色变,这也就造成了在“现代文学”框架下民国旧体文学研究的缺位,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才有所改观。张赣生先生的专著《民国通俗小说论稿》(重庆出版社,1991年)就是最早以民国为断代年限的通俗小说论著。在本书的《自序》中提到:“民国通俗小说仍遭文学史排斥”,《上篇·民国通俗小说总论·通俗小说辨》中又进一步说“民国的通俗小说,作为中国通俗小说发展历程上的一个环节,它一方面继承了明、清小说的传统,另一方面又适应时代的变化而有新的发

① 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271页。

② 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337—338页。

展,这两方面合起来就构成了它的基本特征”^①。他将民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12—1919年是第一阶段,这是由晚清小说向民国小说的过渡阶段;1920—1929年是第二阶段,这是民国南派小说的兴盛时代;1930—1949年是第三阶段,这是民国北派小说崛起的时代。该书把民国的旧派通俗小说作家分成南、北两派分别加以评价和分析,南方作者如海上漱石生、包天笑、李涵秋、蔡东藩、程瞻庐、平江不肖生、何海鸣、姚民哀、顾明道、文公直、秦瘦鸥、王小逸,而北方作者则有董濯缨、赵焕亭、陈慎言、张恨水、刘云若、陈墨香、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王度庐、朱贞木、徐春羽、耿小的、戴愚庵。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很多通俗小说作家同时也是文言小说作家,如包天笑、李涵秋、蔡东藩、程瞻庐、顾明道等均有文言小说存世。

进入新世纪以来,民国文学的研究越来越走向全面客观和多元,民国旧体文学也开始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民国文言小说研究方面,庄逸云博士的学位论文《清末民初文言小说史》(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对清末民初文言小说在其最后阶段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总结,主要包括清末民初文言小说的生存背景和发展状况的宏观研究,也包括对部分旧体传奇、笔记小说和新型的文言小说如长篇章回体的《玉梨魂》、《碎琴楼》以及部分自叙传小说等进行微观研究。笔者的博士论文《晚清民国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年)的研究重点则在以志怪传奇为主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上,对晚清民国时期近200种志怪传奇小说集进行了研究。另外,郭战涛博士的《民国初年骈体小说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则是在其2008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毕业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该书选取民国初年(1912—1919)的“骈体小说”为研究对象,从题材类型、叙事模式、创作和接受环境等方面系统深入地考察了民国初年小说与骈体的结合带来的形式变革。张广兴的硕士论文《民初骈体小说文体学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则从文体流变角度探讨民国初期骈体小说出现的原

^① 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3页。

因,自足和不足,继承和创新。钱振纲教授所著《清末民国小说史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虽然从题目上看似涵盖了整个晚清民国的小说发展情况,评论者也认为该书“对清末民国小说史做了一个全面而清晰的勾勒、梳理、编排和分类”^①。但其实该书关注的重点仍然是新文学,对于民国时期大量存在的文言小说则基本没有涉及,因此这部小说史还不能说真正反映清末民国小说的全貌。吴礼权先生《清末民初笔记小说史》(台湾商务印书馆,2011年)主要对“国史派笔记小说”、“轶事派笔记小说”、“事类派笔记小说”、“杂俎派笔记小说”四类“笔记小说”集共60余部进行了分类考索,因限于“笔记”体研究,所以除《庸闲斋笔记》和《退醒庐笔记》外,文言体的志怪传奇集以及新体文言小说则不在其研究之列。近年来,学术界也有不少论著和单篇论文对鸳鸯蝴蝶派以及林纾、苏曼殊、李涵秋、徐枕亚、李定夷、周瘦鹃、吴绮缘等人的旧体文学创作成就进行了前期研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参考。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民国旧体文学特别是小说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但总体上来说,仍然有大量的基础性工作要做,并且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一部能够全面客观反映民国文学史全貌的著作出现,也没有比较完备的书目类工具书,如民国戏曲总目提要、民国小说总目提要、民国诗词总目提要等,在具体作家作品研究上仍有大量空白需要填补,对于民国文学研究者来说依然任重而道远。

第二节 民国文言小说的存在和发展概况

要研究民国文言小说,首先要对民国(1912—1949)期间产生的文言小说书目及报刊发表的单篇文言小说作品进行梳理和研究,在完成

^① 李岫《评钱振纲〈清末民国小说史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5期。

叙录撰写的基础上对民国文言小说史发展脉络进行勾勒。民国文言小说的现存总数,主要是文言中篇小说、文言小说集和报刊文言小说的发表数量,笔者据相关书目及个人访求和搜检所得做了初步统计:民初出现了大量文言长篇小说,多数是章回体形式,在我国小说史上出现如此多的文言章回体小说是绝无仅有的事情,最终纳入笔者取材范围的文言长篇小说有50余部,主要集中在民初的七八年间,“五四”后文言长篇很快在文坛上销声匿迹。至于文言短篇小说集数量,《民国时期总书目》^①收民国创作的文言小说集约50部,加上笔者在各地图书馆的访书所得,最终纳入笔者取材范围的文言小说集共94部,其中民初(1912—1919年)45部,二十年代(1920—1929年)29部,三十年代(1930—1939年)14部,四十年代(1940—1949年)6部,这其中不包括以人物琐事和随笔为主要内容的作品,若将民国的人物琐闻笔记加进去,总数在百部以上。民国文言小说的另一重要来源是报刊文言小说,目前对散见于民国时期报纸、期刊中的单篇文言小说进行整理汇总仍然存在一些困难,但笔者也就搜检所及,对民国的报刊文言小说进行爬梳和整理,目前列入笔者统计范围的报刊文言短篇一千余篇,其中民初1912—1919年间的文言小说500余篇,1920—1929年间300余篇,1930—1939年间160余篇,1940—1949年间40余篇。虽然以上数量并非民国文言小说的全部,但总体上可以看出文言小说的发展态势,同时也让我们对民国文言小说的存在和演变状况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民初文言小说并非如一些文学史家所断言的那样一直是江河日下,而是有过短暂的辉煌时光,而这一辉煌和短暂的繁荣离不开晚清文学的积淀。晚清“梁启超发起的三次革命,即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

^① 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国文学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

说界革命中,小说界革命最为当时文人热情接受”^①。在此后掀起的提倡小说的文学运动浪潮中,出现了《新小说》(1902—1906)、《绣像小说》(1903—1906)、《小说月报》(1906—1908)、《小说林》(1907—1908)等著名的小说期刊。这些杂志都纷纷刊出征文广告,依托本社同仁,向社会广泛征求稿件,遂成为一时的风气,这些措施让“卖文为生”成为可能。1905年,清廷公布废除科举:“著即自丙午(190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②科举制的废除切断了长期以来文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建立在科举制及官本位之上的文学生产体制土崩瓦解。文人失去了传统的仕进之路,而且“文字而外无他长”^③,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又有利可图,于是许多读书人纷纷投身于创作,将其作为谋生之路。对于许多“职业”文人来说,依靠写稿卖稿可以养家糊口,甚至过上较为宽裕的生活,而不必如前人那样为了生计而另谋出路,文学创作成了他们主要甚至唯一的生活内容,由业余而专业,于是社会上第一批职业化作家便应运而生了。

在创作理念上,晚清的李伯元、寅半生、王国维等人提倡游戏文学观。李伯元以寓庄于谐的风格于1897年在上海创办第一份小报《游戏报》。他在《论〈游戏报〉之本意》中说:“或托诸寓言,或涉诸讽咏,无非欲唤醒痴愚,破除烦恼。意取其浅,言取其俚,使农工商贾妇人竖子,皆得而观之。庶天地间之千态万状,真一游戏之局也。”^④这种游戏文学观对民初作为文言小说创作主体的鸳鸯蝴蝶派具有直接影响。

对清末民初文言小说创作产生影响的还有白话文运动,与提倡新小说相对应,维新派的小说家还提出了用白话创作的主张,从而挑起另

① (美)孙康宜、(美)宇文所安主编,刘倩等译《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492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五),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392页。

③ 吴双热《枕亚浪墨·序》,见徐枕亚《枕亚浪墨初集》,上海:小说丛报社,1915年,第4页。

④ 李伯元《论〈游戏报〉之本意》,《李伯元全集》(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页。

一场论争。出于矫枉的需要,梁启超、裘廷梁等人对旧体文言的第一轮攻击,虽然造势甚大,但在文学创作领域收效甚微。“五四”前夕,新派作家和批评家们再次对旧体文言小说展开攻击。管达如《说小说》第六章《中国旧小说之缺点及今日改良之方针》中,认为旧小说缺点之一就是“长迷信依赖之习。人贵自立,中国之旧小说则动丧人自立之性者也。其故有二:一曰教人以依赖鬼神,如为善获福、为恶获祸,主张因果诸小说是也”;“一曰造作荒诞无稽之语以坏国民之智识也”^①。1918年,志希(罗家伦)在《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一文中将当时中国新出的小说分为三派:第一派是罪恶最深的黑幕派;第二派的小说就是滥调四六派;第三派的小说为笔记派。并将“笔记派”小说分四支:一支是言情的;一支是神怪的;第三支是技击的;最后一支是轶事的。神怪的笔记又可分为两小支:一支是求仙式的,另一支是狐鬼式。^②以上“四六派”和“笔记派”可以说囊括了当时旧体文言小说的大部分内容。1918年,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现在的小说(单指中国人自己著的)看来看去,只有两派。一派最下流的,是那些学《聊斋志异》的札记小说。……此类文字,只可抹桌子,固不值一驳。”^③由以上的言论可以看出,新派作家和批评家对文言小说尤其是其中的旧体文言小说是甚为鄙视的。但即便如此,民国文言小说仍然在逆境中苦苦支撑,并没有随着民国的建立而退出文学舞台,甚至在民初创造了不俗的成绩,一度与白话分庭抗礼甚至略胜一筹,一直维持到民国结束,文言小说才真正消失。

清末民初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各种思潮剧烈撞击,为小说发展的多样化提供了思想源泉。东西文化的碰撞融合和思想争鸣带来了小说体式的丰富多彩,各种新的小说样式纷纷登台亮相,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继承与创新、文言与白话、长篇与短篇,都在易代之际的文学

① 《小说月报》1912年第3卷第11期。

② 志希(罗家伦)《今日中国之小说界》,《新潮》1919年第1卷第1期。

③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号。